

改革开放30年
广东农村村落变迁
案例研究丛书



变革与延续

——梅县书坑村的变迁

杨小柳 梅方权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30年

► 广东农村村落变迁

案例研究丛书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特别委托项目

变革与延续

——梅县书坑村的变迁

杨小柳 梅方权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革与延续：梅县书坑村的变迁/杨小柳，梅方权
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2

(改革开放 30 年广东农村村落变迁案例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029 - 3

I. 变… II. ①杨… ②梅… III. ①农村经济—
经济发展—研究—梅县 ②农村—社会变迁—研究—梅县
IV. F327. 654 C912.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237 号

出 版 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柏 峰
装帧设计	张力平 吴德灏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 25
插 页	1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029 - 3
定 价	45. 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95 37579604】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林 雄 郑德涛

副 主 任 蒋 斌 梁庆寅 田 丰 黄尚立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晋清 王建新 刘志伟 杜新山

李仲飞 李夏铭 何高潮 邹卫东

金炳亮 周大鸣 郑 毅 麻国庆

蔡 禾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1

引言 / 1

一、研究问题 / 2

（一）乡村经济的巨变 / 3

（二）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父子一体”社会的回归与延续 / 8

（三）文化发展的脉络：传统的延续和创新 / 12

二、研究经过 / 14

（一）研究目标 / 15

（二）调查点的选择 / 15

（三）研究内容 / 18

三、研究方法 / 18

四、叙述结构 / 20

第二章 书坑村概况 / 22

一、地理环境 / 22

二、人口 / 30

三、社区历史 / 35

第三章 小地方与大社会：农村改革开放 30 年 / 37

一、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 / 37

二、广东农村的改革开放 / 42



三、梅县农村改革 / 46

第四章 村域经济的变革 / 53

一、农业的发展 / 53

(一) 粮食和耕地 / 54

(二) 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 / 58

(三) 农业生产季节活动 / 63

二、乡村都市化：非农产业的发展 / 64

(一) 非农产业的种类 / 64

(二) 农民阶层与群体分化 / 68

(三) 城乡联系 / 71

三、收入与消费水平 / 74

(一) 经济收入 / 74

(二) 日常收入和消费 / 75

(三) 仪式性消费 / 77

(四) 待客消费 / 82

第五章 村落共同体的延续和变迁 / 84

一、家庭 / 85

(一) 家庭的规模和构成 / 85

(二) 家庭分工 / 88

(三) 家庭关系 / 91

(四) 生育和收养 / 99

二、祖屋与宗族 / 102

(一) 祖先和子孙的居所：围龙屋的空间结构 / 103

(二) 祖先和子孙的一体 / 108

(三) 祖屋的变迁 / 121

三、现代“绅士”：华侨和乡贤 / 129



第六章 乡村社会治理与地方秩序 / 138

-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政权建设 / 140
- 二、基层干部：从讲究阶级出身到看致富本领 / 146
- 三、资源整合能力与村庄治理 / 157
 - (一) 转折时期的邓光辉 / 157
 - (二) 1987—1996 年的村委：筚路蓝缕 / 159
 - (三) 1996—2001 年的村委 / 162
 - (四) 2001 年以来的村委 / 166
- 四、村治面临的新挑战与基层政权建设 / 167

第七章 社会生活的变迁 / 176

- 一、教育 / 176
 - (一) 基础设施和师资 / 178
 - (二) 教学情况 / 180
 - (三) 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互动 / 181
 - (四) 留守儿童 / 181
 - (五) 对教育的看法 / 184
- 二、农村医疗健康服务 / 186
 - (一) 村民视野中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 / 186
 - (二) 合作医疗在基层的具体运作情况 / 191
 - (三) 合作医疗之外：村民日常医疗健康行为 / 195
- 三、仪式的变迁 / 197
 - (一) 婚礼 / 197
 - (二) 丧礼 / 204
 - (三) 婴儿满月 / 226
 - (四) 进花园、出花园仪式 / 227
 - (五) “卖乖”习俗 / 229
 - (六) 春节仪式 / 229
 - (七) 祚福 / 234
 - (八) 搬新屋 / 237



第八章 结语 / 240

附录一 村支书江文芳访谈录 / 250

附录二 梅县城东镇概况 / 316

附录三 梅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 / 318

附录四 梅县城东镇书坑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实施方案 / 329

附录五 书坑观音庵归属石碑 / 335

参考文献 / 337

后 记 / 342

引 言

这是有关一个客家村落在 30 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发展和变革、社会秩序建构和维系、文化延续和创新的研究。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从国家的角度和从上到下的视角看，中国的乡村社会面临着几大转型：物质层面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转型；制度层面在于乡村如何更好地自治，国家如何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控制以及从臣民到国民或者公民的转型等；精神层面在于从“封建迷信”到唯物主义等的转变，以及旧传统的新创造。由于深受单线进化论和长期以来革命理论的影响，上述国家和上层精英的话语似乎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命运。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或者说更早开始，中国乡村的生产方式就开始受到工业化大生产的冲击，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本来是非常寻常的事情，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但是一旦这种变革是来自外部力量的挤压而不是内在的需要或内源的动力，一旦这种变革带有了种种文化冲突的味道，这种变革就非同寻常。

百年历史，被作为问题改造的乡村社会，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动异常频繁和剧烈，乡村社会展现出来的变迁路径和结果也常常超出人们的意料。而 30 年改革开放的农村变迁，是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农村传统习惯和农民实践互动的结果。本研究就是以村落



社会 30 年改革开放的变迁历史为切入，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一方面展现乡村变迁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追溯万变之中的乡村延续性。

一、研究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的乡村社会开始了新一轮的剧烈变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观背景下，这一变迁涵盖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形态等方面。30 年农村改革既是中国乡村百年变迁的一个历史片断，同时也是我国 30 年社会转型剧烈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

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在诸多研究中，一类重要的观点采取以问题取向的路径，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变动出发，思考中国社会变迁的前景。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的推进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陆学艺等进行的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职业分化，以及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中国当代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① 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30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面临着“断裂”的风险，有一部分人（下岗职工、农民工）被抛出了社会结构之外，没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这些阶层也很难构成社会的整体，社会由此出现断裂。断裂社会的运行状态是失衡，使得原先维系社会秩序一系列体系的失效，这个社会

^①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9 页。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陆学艺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面临着不稳定的因素。^①

人类学从其所特有的文化认知体系^②出发，却看到了在剧烈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延续的一面。从村落文化发展的脉络来看，人类学学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百多年变迁的过程展示了传统和现代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对立与统一的过程。政治的变迁，虽然引起了村落各方面的变化，但一些最基本的因素却顽强地保存着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如乡村最基本的诸如家庭、婚姻、信仰和习俗（制度和观念层面的文化）就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尤其是观念层面的文化更是难以改变。^③

基于笔者在广东客家地区田野调查和相关文献资料，本文一方面试图回顾乡村社会 30 年剧烈变迁的过程，思考乡村社会在变革中面临的挑战和今后的走向问题；另一方面也想探讨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在巨变过程中的延续和创新，这种延续和创新“赋予当代的社会现实有价值的历史内涵，对文化模式、文化符号和文化主题进行操纵、创造和重新组合，从而使当代社会获得合法性的地位”^④。

（一）乡村经济的巨变

从宏观决策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讲，我国农村的改革开放大致

①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7～132 页。

孙立平：《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4 页。

② 人类学的文化认知体系大致包括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在文化相对论理念支持下的自下而上的平民视野；二是文化整体观理念支持下从经济、政治、宗教信仰、家庭亲属结构四个基本的维度出发认识文化，四个方面是有机整合的系统；三是关注文化系统的变迁。

③ 笔者看来，这一观点实际上贯穿了人类学有关文化变迁研究的始终。以这种观点解释中国社会近现代化历程的视角，一直延续在从中国老一辈的人类学家，如费孝通、杨懋春、林耀华、许烺光等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相关论述到今天人类学家就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的研究中。

④ [美] 西奥多·C. 贝斯特著，国云丹译：《邻里东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 页。

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之初的1978年到80年代中后期，是在农村内部进行，标志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改革了过去人民公社的经营体制，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让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市场的需求去发展生产，去选择自己愿意干的职业。这些都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之后进入第二阶段，寻求、培育市场机制，持续到20世纪末。在农产品的供给丰富之后，国家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实行计划收购和销售，这个阶段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20世纪末至今，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略，尤其是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的提出，为农村的综合发展指明了方向。

广东农村的改革变迁首先也是从农村经济开始的。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二是以外向型为主的乡镇企业尤其是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三是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发展农业适度经营和规模经营，大力发展三高农业，建立农产品商品基地；四是广东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和“反租倒包”等土地流转办法，实现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农业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为壮大集体经济开拓了新的路径；五是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广东已基本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和条件。近年来，广东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向保护支持农业的政策倾斜，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城乡统筹发展大步向前推进。^①

一说到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多人把“三农”问题归结到

^① 参见周大鸣：《告别乡土社会——广东农村发展3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人口过密的根源上。无可否认，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周大鸣在许倬云先生和黄宗智先生研究的启发下，在对潮汕地区凤凰村的百年变迁研究中，特别关注了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和乡村发展的密切相关性。他指出，人口密度高并不是一个现代的问题，我们今天把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归结于人口太多是一个历史的误解。而实际上，由于人口的分布不均，人口太多的问题是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在已有土地上提高产量，这是中国历史上应对人口多所采用最普遍的方法。由于要提高单产量，就必须不断改进农业技术。故精耕细作的农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精耕细作的农业简单讲就是在单位面积上努力争取最大的收获。

中国自农业产生，就倾向于精耕细作，而非粗放农业。中国乡村农业的精耕细作已达到极高的地步，可是仍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再加上各种天灾人祸，使得人们长期生活在为基本的温饱而奋斗的漩涡中。精耕细作的农业产生家庭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导致市场网络的建立，大城市、小城市 and 不同层次的集镇成为网络的枢纽。这样，城市与乡村是互动的，只不过在古代由于压抑城市工商业，才迟缓了城市的发展。自近代外国列强的侵入，在沿海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工商业城市，对乡村手工业的打击相当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成为城市工商业的职工。因此在无荒可垦、无地可移的情况下，都市化和工业化是解决乡村人口过密化的一个途径。^①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经济巨变，激起了整个社会各种连锁反应，其起点就是为大集体所遮蔽的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再次显现。

一是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出现，打工成为广东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据调查，2004 年底广东流动就业总数约 2200 万人，其中本省近 600 万人，外省 1600 万人，其中农民工占 74.6%，约 1640 万人^②。目前，广东正在推进本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根据《广东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构想》，2005 年到 2010

① 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2～310 页。

② 广东省农民工问题调研组：《广东省农民工管理服务问题调研报告》（2005 年）。



年，广东省要组织 270 万名农村青年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向非农产业转移本省农村富余劳动力 480 万人以上，使全省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由目前的 64% 提高到 72%。

从宏观来看，广东省在地理范围存在着农村劳动力梯度转移的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纯劳动力输出地、既是劳务输出地又是输入地、劳动力输入地。广东北部山区和东西两翼属于劳动力输出地，这些地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流向为本县以外，本省以内。全省流向本县以外、本省以内的占流出本乡镇从业人员总数的 61.95%，其中流量较大的北部山区和西翼地区分别为 76.65% 和 68.30%^①。环珠江三角洲的次经济发达地区，如江门、台山、新会、鹤山、恩平、三水、高明等地，既是劳务输出地，又是输入地。而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则是净劳动力输入地。就微观来看，各个地区内部又都同时存在着劳动力的输入和输出。特别是那些位于城镇周边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主要在邻近的城市。如笔者调查的书坑村，距离梅州市区仅 8 公里，该村 80% 以上非农就业的村民的工作地点在梅州市区，村民们像城市的上班族一样，每天通勤于城乡之间。

二是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发展，费孝通的相关研究就已经指出，家庭副业是中国乡村精耕细作农业的重要补充，其所能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了农业本身。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农村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获得了较快发展，其重要性已经超过农业，成为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村庄各个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多样，家庭的成员根据其性别、年龄的不同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多种经营的分配上，已打破由青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老年人、妇女和孩子从事副业的格局，出现老年人带孩子、做家务，从事农业，保证家庭粮食供给，而青壮年男女从事各式各样的非农产业，保证家庭的现金收入。“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的发展才终于

^① 卜新民、李珠桥：《广东农村从业人员状况及剩余劳动力就业思路》，《南方农村》1999 年第 5 期。



减少了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①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加深了城乡之间的联系，成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最有效的动力。对于这一发展趋势，有的称之为“城乡一体化”，有的称之为“城乡协调发展”，有的称为“城镇化”等，但核心的内容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协调城乡关系。

三是农民的分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这场转型首先是一场农村经济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化取向的确立，为乡村社会的分化和农民的分层创造了社会条件。各地村庄在改革和发展中自主探索社区发展道路，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领导素质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农村日益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有相当部分村庄通过村办集体企业的发展，逐步实现了社区经济的工业化和再集体化，以集体化的方式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并形成集体工业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另有相当数量的村庄主要依靠个体工商业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推动村域经济的繁荣和社区工业化，以个体私化的方式实现农村工业化，并形成个体私化工业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更多的村庄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突破了城乡壁垒，慢慢弥合着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

与乡村社会分化同步的是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同质性和均等性的社会平衡被打破，农民在谋生手段、经济水平、社会经验、价值观念、个性心理等方面都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农民有机会向新产业或是市镇的流动，接触了具有较高现代性的非农业组织与环境，农民在行业、收入、权利等方面分化成具有不同的新型利益群体。相关调查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分化可大致概括为：农村基层干部、集体企业管理人员、乡镇集体企业工人、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智力型自由职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雇工阶层等八个阶层。^②

①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7 页。

② 参见曹泳鑫：《论转型时期的农民政治参与》，《开放时代》1997 年第 7 期。



（二）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父子一体”社会的回归与延续

中国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为体现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历时性”，人类学者在中国的研究很早就尝试走出传统人类学功能主义在“封闭性社区”、“整体论”和“无历史”等方面的局限。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常常与人类学的传统民族志研究相结合，力图在“小地方”的社会场域的描述之中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弗里德曼对中国汉族村落社会的宗族研究强调中国的村落研究应该注意探讨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① 萧凤霞对新会环城区的调查，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论述了政府的意识是如何渗透到农村，农民在行政体系上慢慢地紧缩自己的网络和宗族组织，村落变得越来越孤立和细胞化；^② 施坚雅从经济人类学的路径展开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等。^③ 在中国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国家与乡村的互动、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是一把最好的钥匙。

老一辈的中国人类学者对中国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就传统中国社会是怎样组成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建构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他的核心概念“差序格局”既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围绕“差序格局”，费孝通概括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如：（1）父系血缘关系的重要性；（2）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3）自我中心的伦理价值观；（4）礼治秩序，即利用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维持

① 参见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179页。

② 参见Siu, Helen. 1989.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1～12.

③ 参见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124页。



社会秩序；(5) 长老统治的政治机制。^①

这种以父系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连接的社会，维持了稳定的乡村秩序，并实现传统的自我传承和维系。如葛学溥描述的潮汕凤凰村，至1949年之前的乡村政治制度有如下特点：一是政府对乡村的直接干预少，行政的影响有限。虽然建立了保甲制度，那些保甲长是宗族或房支的领导人，只是乡村与政府的中间人（向官方传达民间的意见、代理官方收税或办理其他事务），而不是政府的代理人。二是自治性政治，亲属关系和家族制度，士绅阶层、祖先与神灵崇拜，社会道德与舆论是统治乡村的主要力量。三是土地制度是家庭占有和公堂（祠堂）占有并存。^②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非常频繁，它的变迁往往是比经济变革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还要深远。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急剧的改变，随着土地制度从“耕者有其田”，到合作化、公社化的变化，社会的政治、行政、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心合而为一，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这样，行政组织建立在基层，政治的影响从间接转为直接。乡村人口划分为不同阶级，每个人被组织到一个社会组织之中，那种以亲属和家族关系整合的村落社区已不复存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地区率先开始改革，逐步实行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将过去由人民公社政权组织系统掌握的生产经营权下放给农民生产者，直接导致了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农户取代生产队成为农业经济的细胞，承包农民取代公社社员成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这一切使得国家政权失去了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促使农村组织系统的基础和运行方式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并导致了人民

^①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3页，第64～68页；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参见葛学溥著，周大鸣译：《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93～148页。